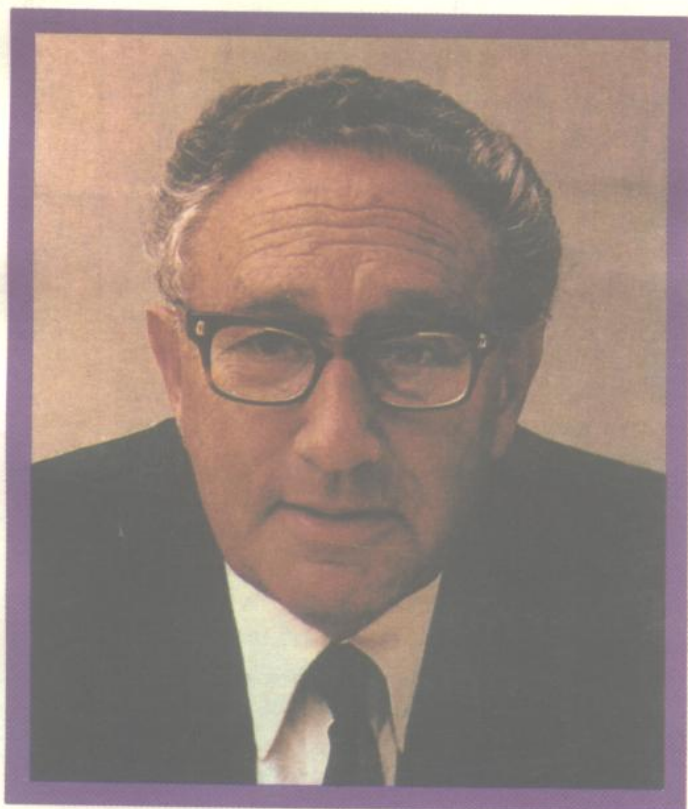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丛书

外交博士基辛格

[美] 罗伯特·舒尔茨辛格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名人丛书

外交博士基辛格

[美] 罗伯特·舒尔茨辛格 著

任东来 吴 耘 黄仁伟

译

米小平 王吉林 劳瑞勤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Robert D. Schulzinger:
HENRY KISSINGER: Doctor of Diplomacy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力超

封面设计: 丁 品

外交博士基辛格

[美] 罗伯特·舒尔茨辛格 著

任东来 吴 耘 黄仁伟 译

米小平 王吉林 劳瑞勤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 8.125 字数: 208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7-5012-0473-x/K·96 定价: 4.40元

出版说明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969—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1977年任国务卿。他自1977年退出政府部门后，仍活动于国际舞台，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本书着重介绍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经历，并对他的功过得失进行了评价。与其他有关基辛格传记不同的是，本书的材料多取自外交文件和有关档案资料，增加了可信性，避免了一般传闻的不实之处。当然，作者对基辛格的评价和书中的某些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读者自会在阅读中加以判别。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任东来（序言、导论、第一章）；吴耘（第二章）；黄仁伟（第三、四章）；米小平（第五、六章）；王吉林（第七、八章）；劳瑞勤（第九、十、十一章）；朱士清同志参加了部分书稿的校订工作。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亨利·基辛格的业绩	4
1 顾问其人	13
2 抓紧解决越南问题（1969—1971年）	34
3 缓和的危险	58
4 突破中国长城	82
5 了结越南问题（1972—1973年）	110
6 基辛格荣升国务卿	130
7 美国进入中东	151
8 尼克松的失败及基辛格的胜利	172
9 越南战争的结束（1973—1975年）	195
10 缓和的衰落（1975—1976年）	221
11 回首基辛格	250

序 言

自从亨利·基辛格为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执掌美国外交政策，提供各种新观点以来，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他曾经处理过的某些问题，诸如与苏联的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中东的战与和，等等，依然是美国政府中最高决策机构讨论的重要问题。

《外交博士基辛格》一书将超过以前有关基辛格外交政策的各种论著，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它所根据的材料是前辈美国外交政策学者在本世纪70年代初期所无法接触到的。尽管基辛格的私人文件存在国会图书馆，但他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那部分更有价值的档案，至今还没有对那些想研究与他有关的各种问题的人开放。尽管如此，通过探究在80年代解密的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文件，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本书的原始材料得益于根据美国总统图书馆“强制性查询制度”或《新闻自由法》要求得到的一些解密资料。任何使用过这类文件的人都知道，要得到它们是个叫人失望的过程，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以本书的研究为例，我的强制性查询要求从福特图书馆中得到的材料远多于从国家档案馆尼克松总统资料规划中的所得。其他一些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根据《新闻自由法》得到的材料刊登在《解密文件参考概览》上。在卡特政府时期提出的查询要求，得到了1969—1970年轰炸柬埔寨和1970—1973年搞乱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行动的宝贵资料。但在里根政府时

期提出的同样要求，却得不到多少最近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资料。

国会的文献补充了本项研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特殊的时代环境——冷战共识的瓦解，国会对越战日益增长的反对，立法者对水门事件的厌恶——促使立法机构关注那个时代的外交政策问题。总统与国会在外交权限划分关系上的革命产出了大批的国会听证、研究、报告和辩论材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时期中任何一项外交问题都远为丰富。

本书还利用了卷帙浩繁的新闻记者当时的记述和回忆文献，数量之大远远超出了任何其他最近美国外交政策的材料。公众在70年代想了解基辛格光辉业绩的渴望似乎是无止境的，记者和他们的编辑也乐于向读者提供所有他们喜欢的轶闻趣事。我曾对《期刊文献读者指南》中的页码作过统计，以比较舆论界对基辛格的注意程度与对他的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的注意程度。基辛格这位二战后最显赫的外交家所占的篇幅，以相当的甚至是巨大的差距超过了他所有的前任。就国务卿而言，对他的宣传材料是约翰·杜勒斯的2.5倍，这是最接近于他的一位；是迪安·艾奇逊的4倍，克里斯琴·赫脱的7.2倍，迪安·腊斯克的11.7倍，威廉·罗杰斯的15倍。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比国务卿罗杰斯还多2.5倍。与前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差距也同样明显。通俗杂志中有关他的故事比麦乔治·邦迪多9.8倍，比沃尔特·罗斯托多7.5倍。

撰写过有关他的报道的杂志很多。他当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民族》或《新共和》等杂志报道的一个主要内容，不过艾奇逊和杜勒斯也是如此。然而，有关基辛格的报道也定期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比如《妇女家庭杂志》、《新潮》或《哈泼斯市场》^①等都有关于他的特写文章。这些杂志无一例

① 这三个杂志均是以女性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消遣杂志。——译者

外地都从未刊登过为以前历届总统效力的安全顾问或国务卿。

可以肯定，与以前政府中在外交政策方面位居高官的人不同，基辛格善于讨好新闻界，设法让它注意自己。另外，由于1972年6月17日非法潜入设在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及尼克松企图掩盖这一事件的作法而引起的一场宪法危机，产生了众多政府官员的回忆录和新闻记者的分析。在这些洪水般涌出的文献中，基辛格也是一位有争议的对象。

基辛格自己的回忆录《白宫岁月》和《动乱年代》同样不能忽略，而且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可能比第一眼的印象要丰富得多。这两部书的篇幅比其他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的类似著作都要大得多，内容也更为详尽。但它们仅仅是个人的、经过筛选的和常常带有辩护性的著作。

《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和其他一些回忆录也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我只是把它们当作回忆来看待，仅此而已。因而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当事人对自己当时所感所思的追忆，而不是他们当时的言行。在引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谈话时，我已注意到这些只是追忆而已。在通常情况下，我还是使用现有的当代文献来确定彼时人们的确切言行。

导 论

亨利·基辛格的业绩

亨利·基辛格执掌美国外交政策之时，正是冷战开始后的最紧要关头。与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一起，他负责结束了全球范围内的直接军事干涉，目睹了苏联作为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的出现。他与苏联人搞缓和，开始与中国的新关系，并使美国成为中东的一个主要角色。

所有这一切，使基辛格赢得了以前任何一个美国外交官都未曾得到的赫赫名声。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把他列为1972年和1973年全美最受敬仰的人物。他赢得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安排了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埃及人因此称他为“魔术师”。那时，甚至他的服饰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曾两度跻身于最佳服饰者之列。穿梭外交使他两次获得“本年度职业旅行家”奖。通俗杂志对他和他的著作也很热衷。《妇女家庭杂志》委托女演员吉纳·洛洛布里吉达准备一篇有关他的图片文章，并重印了一位对基辛格着迷的法国记者所著书籍的部分章节。1974年以前，记者们紧盯着基辛格和他的女性伙伴，他在这年3月结婚后，又盯上了他和他的太太。南希·基辛格以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知名人士，发表她对婚姻、服装和外交政策的见解。甚至连基辛格家里的狗也有它的故事。毫不奇怪，漫画家也很喜欢他：在他们的漫画中，超级老K^①飞翔在天涯海角；他玩地球于

① 基辛格（Kissinger）的起首字母是K。——译者

股掌，忽而把它举过头顶，忽而又把它放在肩上；他驯服雄狮，又向外交家们施展魔法；他对议员咆哮，同时又在奉承总统；他还被比作让小人国里的人绑在地上的格列弗。在退出政界之后，他对文学也产生了影响，成为众多小说、故事、戏剧、甚至歌剧其中的一个角色。

不过，对基辛格及其外交的这种热情在福特政府结束时大为衰退。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由于福特总统的共和党挑战者罗德·里根和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都抨击基辛格执行的美国外交政策，基辛格就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1976年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众对基辛格的好印象已从1973年的80%下降到50%。南越的溃败损失巨大，同样，早先与苏联人缓和的诺言也未能兑现。到福特政府结束时，美国尚未完成中东的解决方案。与中国的新关系停滞了。基辛格还未能逃脱水门丑闻的影响。有关他授权对下属及新闻记者进行电话窃听的报道纠缠了他好几年。到福特政府结束时，他几乎成为孤家寡人，大声惊叹美国的民主制能否维持一种“现实的”外交政策，担心他的同胞能否忍耐与苏联平等相处。

“创造奇迹的人还是替身演员？”这是1977年初一篇评价基辛格功绩文章的题目。此后这一问题一直跟着他转。在离位后的岁月中，他的声望大起大落，取决于作家和政治家们的观点如何。他的两本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回忆录，《白宫岁月》（1979）和《动乱年代》（1980）是美国外交官所有回忆录中内容最广泛和最精采之作，这两卷书使读者想起在70年代初期他是怎样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在第二卷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新闻记者西摩·赫什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指责基辛格作为尼克松国家安全顾问的所作所为。赫什抓住基辛格个人的特点，声称他的不安全感和自私导致他滥用下属，欺骗同僚，讨好上司。

尼克松时期其他政治参与者的回忆录勾勒出基辛格不同的画像。尼克松自己把基辛格看作是总统的一位助手，而不是新型外交政策的开创者；是总统自己想与苏联人搞缓和，并建立与中国

的新关系。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他一度是电话窃听的目标，也认为与尼克松的外交成就相比，基辛格的成就平平。当年水门事件的主要人物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尔希曼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把基辛格视为不知羞耻的自我推销者。

当时的外交官也提供了他们的回忆录。参加过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雷蒙德·加特霍夫，写了一本长达1000页的大作，书中详细记载了与苏联的缓和。他论证说，由于草率的外交工作，基辛格逐渐破坏了缓和最终的感召力。他在缓和开始时对细节不甚注意，而在缓和结束时，又让自己陷入了反苏的歇斯底里。加特霍夫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上司杰拉德·史密斯，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双重会谈》，他的结论也是基辛格过于注意外交的政治结果，牺牲了真正的和长期的成果。一位在尼克松时期担任多年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的职业外交官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则指责基辛格忽视专家的建议，这一指责反映了约翰逊许多同事对基辛格的愤怒情绪。

但基辛格在其同事中也不乏辩护者。当他还在任时，马文和伯纳德·卡尔布兄弟出版过一部高度赞扬他的传记《基辛格》。一度是基辛格下属、后来成为《外交》季刊编辑的威廉·海兰出版了《不共戴天的对手》一书，这是一部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美苏关系史。他在书中赞扬基辛格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处理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其他几位后来在下几届政府中出任要职的下属，像曾担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出任国务卿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都一直赞扬基辛格。

基辛格的政敌也减少了他们早先对他的敌对情绪。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便发现了基辛格内在的价值。他在1983年任命基辛格为美国对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基辛格在职期间并未注重西半球问题，但里根总统相信他在公众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使他对任何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都会给人留下一个良好印象。后来，当里根转向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控制时，他们再次征

询基辛格的意见。里根在准备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谈时，也曾向基辛格讨教。这位曾是基辛格缓和政策的批评者开始相信，基辛格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是无价之宝。

向这位曾是哈佛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普通教授讨教的原因何在？是像他及其众多辩护者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成绩斐然？他创造了他所称的某种“和平结构”吗？他把美国对外关系置于一种“成熟”的坚定基础，置于对华盛顿拥有的力量范围和限制的正确估价之上了吗？他是不是把欧洲外交官的世界眼光与美国人的乐观和理想主义最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外交政策专家和精英群体中目光敏锐者确信美国必须发挥作为大国被赋予的作用？他的吸引力是否基于在23年后恢复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控制军备竞赛，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成功地使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参加者脱离接触，并把美国从越南解救出来？他的美国支持者对他持久的称赞是不是因为欧洲人给予这位前国务卿众多的荣誉，而他们对应该如何执行外交政策的认识要比美国人深刻得多？

是的，在许多方面，但不是全部是这样的。基辛格的一些成就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坚持与苏联搞缓和和承认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等方面。尽管这些成就斐然，但与他精心塑造出来国际关系的天才这一形象相对照，就显得苍白了。当埃及人把他称为“魔术师”时，他们是在赞扬而非取笑他。在基辛格声望最高的1973年，他的美国支持者也认真地认为他的外交是一种奇迹。这种英雄崇拜必然要付出代价。当他将要离职时，魔法消失了，基辛格看来更是个幻想家而非奇迹创造者。他早期获得的赞誉变成了空中楼阁。他的外交看上去是循规蹈矩的，并不是创造性的；他的许诺与其实绩之间的鸿沟自然导致了幻想破灭。

基辛格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因为他注重的是二战后外交界

人士所提出的常见的主题。他身上传统的那一套东西是他跻身于最高层的力量源泉。他的事业代表了学术界专家对外交影响的顶峰。他在50—60年代的学术著作非常简练地概括了1945年以后在美国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传统。基辛格是这样一位大师，能把少数思想家所倡导并发展了的美国有考虑地参与世界事务的观念通俗化了。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务卿，基辛格试图平衡理论与日常外交政策实际需要之间相互抵触的要求。基辛格谈论的现实主义理论，为适应政治的需要而出现的政策提供了学术上的证明。对于瞩目于现实世界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结合。

基辛格之所以拥有这种创造力，是因为他促成了美国外交政策自冷战以来意义最重大的转折。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冷战早期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基辛格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而且还陷入了外交政策官员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之中。国内对外交政策的一致认同持续了20年之久，在越南战争的巨大灾难中崩溃了，他在此时登上了权力的舞台，这既是他的个人不幸，也是他的大好机会。当外交政策精英集团的成员对遏制苏联不再有共同的动力时，基辛格为美国提出了其他目标。他曾一度赢得某些成功——比如与苏联缓和，改善对华关系，在中东实现停火——但他没能促成一种新的共识。

议员们对行政部门执掌外交的权威性的质疑导致国会不再默不作声。基辛格发现在其声称拥有外交的特殊智慧时，他并没能占有这一领域。外来者对已经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地的入侵，产生出基辛格操纵公众舆论的一些最著名的事例。基辛格对一些喜欢他的记者阐述其行动的合理性，许多次是试图减少对其竞争者的支持，如白宫工作人员，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

一幅基辛格外交的清晰图画只有透过他与尼克松、福特总统及其工作班子的关系的棱镜才能获得。顾问的作用是理解现代美

国政府的关键因素，总统与顾问相互需要。尼克松有赖于基辛格提供外交专家的权威看法，反过来，基辛格运用他与总统的联系来发挥自己政治上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意志。基辛格与福特的关系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总统，在外交上也无专门训练，只好从一个接近其权力顶峰的人那里得到指导。国务卿向福特提供外交领域中现成的方案。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辛格显赫的声望在1975—1976年间变得对福特毫无用处。当福特试图以自己的力量赢得选举时，这位新总统面临着相形见绌的威胁，他的这位顾问便成了一种不利条件。

还有些因素可以解释对基辛格的兴趣持久不衰的原因。抨击者抓住基辛格的错误、口是心非、不讲道德、自我标榜，甚至可能是犯罪不放。在他1977年1月结束公职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发现，“所有这一切是这样令人困惑不解；全国新闻俱乐部为他制造了一个肚皮舞女^①，并对他有关世界和平的看法给予持久的喝彩。”哈莱姆环球旅游者协会接纳他为名誉会员。参议员们赞赏他的智慧。在刘易斯看来，“秘密和欺骗都在于他善于玩弄权力”。“江湖骗术是其秘诀所在。亨利·基辛格是我们的巴农^②”。对批评者来说，基辛格的事业已如赫什指出的，是“权力代价”的一种尺度，一个道德的警示。

批评者指责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真实的，让新闻界大为夸张了，刘易斯称，基辛格“就像奇迹博士拉小提琴一样在表演”。批评者注意到，越南战争延续的时间远比1968年时人们预计的要长。从1972年10月到1973年1月在巴黎达成的解决方法本可以在早些时候就取得成功，从而减少更多的生命损失。他们抱怨说，基辛格对中东有关问题的漠不关

① 指新闻界对基辛格1972年5月30日访问德黑兰时观看伊朗肚皮舞表演的报道。——译者

② P·T·巴农（1810—1891），美国著名巴农—巴莱马戏团的创始人。

心，加之他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地位的全面损害，助长了1973年战争的爆发。只是在战争开始后，他才在解决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紧张关系中起到了众所周知的作用。这时问题变得更难以处理。根据这一看法，1973—1974年他在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间的穿梭，只是阻止了危局的进一步恶化。再往东，他在伊朗继续推行大力武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军队的错误政策。在基辛格离开国务院后仅两年，国王的政府就土崩瓦解，美国在这一战略地区的影响也随之不复存在。在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就孟加拉独立的战争中，个人的好恶和不恰当的地缘政治考虑相结合导致美国愚蠢地“偏袒”巴基斯坦。甚至在打开与中国关系之门这一点上他也受到批评者严厉的指责。赫什对基辛格的厌恶超过了对尼克松的轻蔑，他贬低这位安全顾问在改变孤立中国这一无效政策中的作用。同时，他称赞尼克松在接受与中国发展关系想法上的首创性，而这一想法在过去的10年中已渗透到外交权势集团中。

诋毁他的人还指出基辛格人品上的缺陷。反对者指责基辛格是一个十足的献媚者，他当面奉承尼克松，在背后却贬低他。在下属面前他是个冷酷的工头，赫什指责他缺少这样一种一位难以相处的上司可以被其工作班子所接受的品质——对雇员的忠诚。还有人指责他挑拨离间，从中牟利，蒙骗多数人，唆使他们反对其他官员，鼓励联邦调查局窃听他人电话，监视他人活动。其他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工作过的白宫官员，通常相信基辛格常以牺牲总统为代价来抬高自己。基辛格在尼克松辞职中的作用是他回避法律、不够光明正大的又一例证。

在1969年轰炸柬埔寨、1970年入侵这个国家以及1972年圣诞节轰炸北越的决定中，基辛格的作用也存在着不合法的问题。他对智利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行动，已引起人们的指控，认为他违反了起码的法律和道义准则。他的反对者抱怨说，在阻止阿连德当选的非法活动失败以后，基辛格帮

助中央情报局搞乱阿连德政府。

许多这类批评非常突出地揭露了基辛格外交中无法辩解的弱点。在当时看来充满希望的外交突破——越南谈判，与苏联缓和，甚至是中东的穿梭——到1976年都黯然失色，甚至是土崩瓦解了。1972年曾大肆提倡的“和平结构”到1976年成为瓦砾一堆。基辛格一向忽视海外经济和社会发展，直到福特政府末期，他才稍稍注意这方面的情况。由于个人的失误，他给自己和自己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更多的难题。他与地位相当的同僚关系很糟，并且是一位专横的头儿。作为一个反对官僚机构的斗士，他赢得了暂时的和战术上的胜利，但最终却失败了，因为他也需要那些他曾围攻过的人们的帮助。这种官僚机构的冲突严重损害了外交政策。他想单枪匹马干的事情太多了，因此当他需要同盟者时，却被捆住了手脚。更广泛地说，他对法律约束的漠视，在国内毁掉了自己的声誉；在海外则损害了美国的尊严。他对国会参与外交政策的愤怒，使之寻求一种始终如一的、合法的和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外交政策变得极为困难。

不过，基辛格现实的外交成就尚无人出其右者。在公众对里根政府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批评声中，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评论道，“只有一个亨利·基辛格，他们在制造出他之后，又破坏了制造模具。”刘易斯在基辛格当权时就是位最尖锐的批评者，他在1984年认识到，“就其记录上所有不道德之处而言，他对付俄国人是很聪明的”。与很少几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范围与限度。

对所有抱怨他忽视海外人权的人来说，基辛格避免了一些干涉行动。尽管缓和被吹过了头，但它将美苏关系置于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打开中国之门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基辛格抓住了最重要的机会，使之成为现代历史上重要的外交转折之一。在基辛格访问北京几年后，美国和中国成为伙伴。甚至是一度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成为总统后进一步

加强了这一新关系。基辛格的中东穿梭外交在行动中确立了一种进程，最终产生出1977—1979年戴维营协议和埃及—以色列的和约。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唯一的一项和约。在说服美国人认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拥有利益的性质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时间里获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人，在他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